

# 诚信缺失的原因探析

景 枫, 李文胜

(河北省委党校 科技文化教研部,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摘 要:**诚信的缺失是由这样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二是个人主观方面及领导干部道德失范的原因;三是社会诚信制度、机制方面的原因。总之,由于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造成的诚信道德传统的断裂,由于传统熟人社会的终结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陌生人交往频率的大幅增高,由于市场经济领域中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由于社会道德示范权威和舆论权威的下降,由于对不诚信者的制裁力度不够,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明显事实,就是仅靠社会个体自觉自愿的道德修养和内心的自我约束去普遍实行诚实守信是不可能实现的。

**关键词:**诚信; 缺失; 原因

**中图分类号:**B 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6)02-0036-07

中国被誉为“礼仪之邦”是与其讲究礼貌、诚信的传统美德分不开的。然而,在当前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违背诚信道德的现象。诚信缺失或信用危机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表现出来,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危害颇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在这方面作些探讨。

## 一、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造成诚信缺失的原因

第一,儒家传统文化的缺陷,是诚信缺失的历史原因。虽然在两千多年前,古圣先贤就强调,诚实守信是为人处世之道、立身之本,是非常重要的道德准则。但是,这种诚信是以传统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朴素的伦理观念,随着自然经济基础的瓦解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传统伦理道德必然走向衰微,而被新的伦理道德所代替。而且,我国传统的诚信观念是讲究上下尊卑等级、内外亲疏有别的诚实和守信。社会诚信成于内而形于外,个人内在的诚实、坦诚是其社会行为能够信守承诺、遵守契约的心理基础。在西方,宗教文化非常发

达,人们的信仰往往是一种宗教信念,而我国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有其优点,但儒家文化作为信仰文化也有其弱点:第一,它缺乏有效的约束力。信仰对人的约束通过两个“内心力量”来维持,一是“内心的激励”,二是“内心的约束”。儒家文化对于培育人们内心激励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它引导人成为“真君子”、“大丈夫”,这是很好的信仰导向。但是它缺乏使人内心约束的手段,因为儒家文化没有“来世”观念,只求“盖棺定论”,只要此生幸福,不必担心“来世报应”,没有来世的“报应”观念,使人对于“恶有恶报”有一种侥幸心理,降低了人们对于各种“恶”(包括违约、失言、失信)的畏惧感。第二,儒家的信仰缺乏有效的实践途径。信仰不是一种口头说教,而是一种对于人生的根本态度,它在本质上是实践性的。信仰各种宗教的教徒遵从的各式各样的宗教仪式就是他们实践自己宗教信仰的方式,但儒家信仰缺乏明确的实践方式。我国古代曾提出了“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立德”是说人在世时道德高尚,死后被人称颂,视为“不朽”。意在塑造自己的道德品格,名垂青史;“立

收稿日期:2005-08-13

基金项目:河北省2004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项目编号:200402033

作者简介:景枫(1957-),男,天津市人,教授,主要从事伦理文化研究。

功”是说人在世时立下功绩,功名流芳百世,视为“不朽”。意在“治国,平天下”,而且是“仁济天下”、不凭武力;“立言”是说人在世时的言论、著作对后世有启迪、有影响,视为“不朽”。是倡导人们写道德文章。但对于普通人,目标很高,难于实现。宋代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都不是一般百姓所能达到的。虽然儒家信仰缺乏明确的实践途径,但儒家信仰文化的宣传却又偏偏特别提倡实践。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家文化也是一种宗教,但和西方宗教的预言方式不同,西方基督教的预言方式是一种“伦理型预言”,传教的先知接受神的委托要求人们把服从神及其意志当作一种伦理上的义务,传教的先知并不是神自身,传教士的“恶”并不是神自身的“恶”,教士们的“恶”也就不会严重动摇人们对于神的信仰。而中国儒教的预言方式是一种“模型型预言”,先知在传道时完全不提神圣的使命或伦理义务之服从,只是诉诸那些渴求得到救赎的人的自身利益,指示救赎之道,这样它就必须有一个关于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概念,并要求先知以身作则。在这种情况下,传道者自身实践信仰的偏离就会动摇受道者的信仰。因此,儒家信仰缺乏明确实践途径的弱点就很明显。

儒家信仰的这些弱点给后人留下了隐患。一是人格的分裂。本来儒家提倡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诚实守信、身体力行,一再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但由于很多被提倡的内容缺乏实践的途径,实际上很难做到,所以就有了一定的虚假性。“礼”和“诚”相互矛盾,在中国文化中出现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礼节、客套、面子等文化现象应运而生。据郑也夫考证,在儒家经典《论语》中,“信”字出现了38次,“礼”字却出现了74次之多。这并不是说礼仪、礼节、礼貌不重要,但确实人们在过分重视繁琐的礼节和虚假的客套中,诚信的本真却受到忽视。二是信仰对象的实用化趋势。由于儒家信仰的实践难题,所以原本作为人生依托的信仰慢慢变成了人生的手段,成了实现自己功利的一种工具,信仰呈现出多元化、易变的特点,不易坚持原则,人们之间的斗争更多地是利益冲突而不是原则冲突,在坚持诚信不能带来利益反而会带来损失的时候,人们就会放弃诚信,认为坚

守诚信者是傻瓜。

第二,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失误造成诚信问题的加剧。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缺陷视为中国诚信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可能会有人提出异议,因为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信仰,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克服了儒家信仰实践途径模糊的问题,应当说为诚信的实施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确实如此,很多人反映建国之初我国的社会风气较好,人的诚信程度也较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新中国的历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相比毕竟太短暂,很难衡量无产阶级的信仰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而且建国以来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生活的失误非但没能使传统的诚信道德及时向现代的诚信道德转变,而且还对传统的诚信根基造成了很大破坏,这是造成当前诚信问题的重要社会历史原因。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弯路使人们产生了“信任危机后遗症”。大跃进的虚假浮夸“放卫星”和人民公社的“假、大、空”,导致失真;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谣千遍即成真理”等,导致失信。“文革”之害不在于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更严重的是搅乱了人们的思想、扭曲了人们的心灵、动摇了人们的信念。“文革”中,“个人崇拜”与“人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事情比比皆是。它扰乱了人们思想,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导致了极坏的社会后果。老百姓的命运随时会因为极少数人一时的喜怒哀乐而改变,在这种极端险恶的生存环境中,人们的欲望不能真实地表达,在内心深处也被人为地设置了许多禁区。在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下,不合主流声音的很多思想和观点,不仅对陌生人不能讲,而且对自己的亲人、朋友也不能讲,以防止发生家庭成员、朋友之间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决裂”。“文革”期间的政治揭发使很多人遭受到“杀熟”的打击,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只因为出身问题或政见不同而反目的、划清界限的比比皆是,儿子揭发老子、妻子批斗丈夫的场面司空见惯。这一切都使得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础发生了彻底动摇。

第三,精神文明建设的薄弱导致诚信意识淡

薄。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我国曾出现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同步的现象,没有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在急于加快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物质文明、社会财富成为衡量社会发展和个人能力的重要尺度,而对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极不充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的认识还主要停留在传统文化和传统意识形态教育的阶段。在传统文化中,认为“无商不奸”,在建国后,出于意识形态上斗争的需要,对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制度的宣传中,充斥着“道德沦丧”、“尔虞我诈”等字眼,人们往往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划等号,这就使很多人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不讲信用,为了利润无所不用其极的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我国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与时俱进抓教育。因此,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诚信意识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形势,没有形成“诚实为荣,失信为耻”的社会风气。

第四,加速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是社会诚信缺乏的社会结构方面原因。中国传统的诚信是以传统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朴素的伦理观念,讲究内外、亲疏有别,尊卑差等。“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一直沿袭着这样一种伦理传统:社会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尖锐对立的、内外有别的伦理信仰和伦理实践,家庭或者家族等社会组织内部伦理及其在与外部社会经济组织交往时所遵循的外部经济伦理。内部经济伦理坚持的是相互信任、真诚守信、合作互利的诚信原则,而在对外交往中坚持的却是截然相反的伦理原则,在这里,哄骗、欺诈、哄抬物价、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等行为成为受内部成员称道的正当谋利行为。”

传统的诚信是和—个社会流动非常小的熟人社会相适应的。传统中国就是这样一个相对封闭,市场经济很不发达的熟人社会。人们彼此之间重人情,重关系,重面子,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之间的信任基础是彼此之间的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等),种种不同的关系构成了彼此之间的道德身份,人们依据自己所处的道德身份明确自己的道德责任、产生相应的道德约束,这种道德约束是从他律转化而来的自律,因为如果自己不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如对君尽忠、对父母

尽孝、对朋友诚信等),就会失面子,不仅会受到他人的谴责,而且可能付出极大的代价——失去在关系网络中的地位,不能得到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反之,一个人因为关系而去履行义务,他会获得信任的加强。

适应现代社会的诚信观起源于西方,诚信的道德责任来源于相互之间的契约。契约是双方或多方协议认可并承诺遵守的行动规则,它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未能履行义务时的惩罚措施,是信任建立的一种法制化手段。契约通过对风险的限定,减少了信任建立的不确定性及非理性,使信任的建立获得了普遍的基础和客观的标准,为信任提供了客观的保障。契约打破了血缘、地缘的限制,使在任何个人、组织、国家之间建立广泛的信任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大了信任的范围。

目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交往面增大,知名交往的社会活动减少,匿名交往的社会活动增多,人们之间很难再从传统的熟人关系中找到自己的道德责任,而必须依靠彼此之间的契约来履行自己的责任,很多人漠视契约所规定给自己的道德责任,而是遵循内外有别的诚信理念,往往对“自己人”讲诚信,对陌生人不讲诚信。由于法律对于违约责任的追究不够,因而他们对于签约的陌生人的失信行为大大增加。同时,加速的社会流动减小了失信的成本,这也是失信现象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流动的增多是当前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的居地、职业、社会地位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社会流动,例如人口的居地流动造成人们交往群体的急剧扩大,互动的持续时间和次数明显减少。根据经济学博弈理论,在多次重复互动的小群体,失信和不合作时成本较高,而当群体成员增加或一次性博弈过程中,失信和不合作的“搭便车者”的成本会大大降低,尤其是在缺乏强有力的失信惩罚时。因此,在社会流动加速的情况下,失信的成本降低,而社会监督和处理失信行为的成本相应增高,会给某些人违背诚信道德提供条件。

## 二、个人主观方面及领导干部道德失范造成诚信缺失的原因

第一,对于个人来说,私有观念是造成诚信缺

失的主要原因。私有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私心”。由于私利的驱使,人变得贪得无厌,他们把金钱看作是人生追求的唯一和最终目标,为了金钱他们不惜丧尽天良、贪赃枉法、寡廉鲜耻;为了金钱,什么人格、爱情、友谊、荣誉,都可以当作商品拿去交换。他们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吃掉别人就是不让别人吃掉”、“若要发,狠心刮”、“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捞外快不富”,其实质是唯利是图和损人利己。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他们不惜冒着风险去做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买空卖空、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尔虞我诈的勾当。资本家的资本从头到脚都是滴着血的肮脏东西。有了20%的利润,它就活泼起来,有了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了100%的利润,它就践踏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不怕上断头台。金钱变成一切动机,金钱变为衡量善恶的唯一标准,金钱高于一切。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关系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发财的渴望。”“除现金交易外,他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金交易’上。”“金钱确定人的价值”。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反映在人们的内心意识里,就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和“拜金主义”思想。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sup>[1](P235)</sup>

私有观念又表现为极强的贪欲。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种贪欲在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际,曾起过瓦解氏族社会,揭开新的阶级社会的推动作用。但在现代社会,正是这种自私心、这种贪欲,促使了一些人的不诚信行为。对于现阶段我国的党政领导干部来说,不诚信的产生是没有摆正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

作为人民的公仆,应当竭力维护和追求社会整体利益,追求人民的利益,使个人利益服从于人民的、社会整体的利益。实事求是地说,追求个人利益并不是不道德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sup>[1](P82)</sup>。因为,人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就要解决吃、喝、住、穿问题,这些都属于物质利益的范畴,这样人们就产生了获取物质利益的要求。但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有范围、有界限的,它应当是在个人正当利益的范围内,以不妨碍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人在个人利益问题上,由过去的完全否认个人利益的极“左”观念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向否认追求个人利益的范围和界限,认为可以不择手段不受限制地追求个人利益。近些年来我们遵循物质利益原则,注重利益导向,这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这也刺激了人们物质欲望的迅速膨胀。不少人讲求实惠、好处、功利,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挣钱发财,甚至有的人为了金钱不惜坑蒙拐骗,以身试法。一些干部同样也受到利益的诱惑,他们看到一些人先富起来,心理上便产生了不平衡。他们很快发现,权力是获得利益、金钱的最便捷的途径。因此他们便不择手段、欺骗组织和群众,竭尽全力谋取有实权、有实惠的岗位,取得权力之后“出租”权力,谋取不义之利。

第二,权利义务观的蜕变。权利与义务是紧密相联的,享有一定的权利就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便会取得一定权利,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不存在无义务的权利。党政干部居于一定的工作岗位,便获得了运用该岗位权力的权利,这个权力是因这个岗位而具有的,并不是个人的权力。行使权力,就要履行好对人民应负的义务,当好人民的公仆。这是一个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权利义务观。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领导干部,由于求利动机膨胀,权利义务观蜕变为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肆无忌惮地侵吞挥霍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这些人受中国封建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以为“官为民之父母”,“官贵民贱”,“官大为尊”,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把弄权、谋私看作自己的本事、能耐,把兢兢业业、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好干部看作是傻瓜,甚至还宣扬什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

白不捞”。这些人的价值观、义利观发生了严重的失衡和扭曲,他们的价值取向趋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在实际行为中表现为急功近利、背信弃义、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种以物质利益为目的的价值追求、重利轻义的义利观念,直接支配着他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交往,导致失信现象的屡屡出现。

第三,两面人格,逢场作戏。这是当前一些腐败干部的典型特征。它表现为政治上严重的失信,表面上冠冕堂皇,马列主义讲得头头是道,实则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明一套暗一套,总是在伪装和做戏。在人们面前,他们道貌岸然,奉公守法,俨然是一个立党为公的好干部;背后却是我行我素,不顾党纪国法,没有起码的道德,为了自己的私利,什么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通通不顾。他们嘴里讲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心里却想着“别人都富起来,我为什么不能近水楼台。”他们一方面喊着鞠躬尽瘁,廉洁奉公,另一方面又奉行着功利主义原则,有利就干,没利不干,小事得要小利,大事要获大利。他们当着群众说“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彻底地反腐败”,私下里却说:“那么多人在搞腐败,比我官大的有的是,为什么我不行?法不责众!”他们有的担任重要领导干部而大部分时间却干着自己的私事,还美其名曰:“干私事就是工作”。这些人不仅是国家、民族的败类,而且是思想道德上的教唆犯,败坏社会风气的罪魁祸首。

### 三、社会诚信制度、机制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会道德秩序失衡。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和道德秩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其相适应的道德秩序日渐瓦解,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与其相适应的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秩序尚在建设中,但远未最终确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新旧经济体制和道德秩序会发生激烈的碰撞和冲突,另一方面,在两者的结合处又容易形成空白点。在这种情况下,旧的道德规范虽还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但其力度日渐缩小,而“诚信”准则尚在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其力度还不足以填补旧道德规范的退却所留下的空白。这种情况就难以避免地导致道德秩序的混乱、失衡,甚至道德无政府状态。生活在

这种社会条件下的人就很容易陷入迷茫、彷徨以至极端自私之中,出现相互间的猜疑和不信任。

第二,市场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存在制度上的缺陷。一是,产权制度存在缺陷。产权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产权模糊和产权保护不够。一方面,产权模糊的直接后果是实际上的所有者缺位,因而经营者只追求权利而逃避责任,只要利益而不不承担风险,只求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最终导致其经营者的短期行为,产生投机心理;另一方面,由于产权缺乏有力的保护,产权的各项权能不能全部实现,企业的利润不是考虑扩大再生产,而是寻求保护,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摊派、吃拿卡要,经营者往往表现出追求短期利益的倾向。二是,诚信中介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双重不足的局面。一方面社会诚信服务行业的社会需求不足,社会和企业对诚信产品的需求十分有限。企业使用诚信产品的意识普遍淡薄,社会其他经济主体大多缺乏利用诚信产品保护经济交往中的利益;另一方面,就诚信服务的供给而言,目前国内还缺少有实力能提供高质量诚信服务的机构或企业,整个诚信中介服务行业的培育缺少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中介服务的市场化程度低。三是,社会信用体系发育不良,信用制度很不完善。我国的信用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银行信用,目前全社会融资总量和全年净融资量中,通过银行信贷融资的比例分别高达80%以上,而工商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这一基本的信用形式发展程度低下。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开始发展,但是发展得十分缓慢,特别是规范化的商业信用,比如商业票据的使用范围和规模还十分有限,企业之间债权与债务关系转移难以规范,债务链条日趋复杂。债权保护制度和信用监控尚不完善。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如民法通则、票据法、公司法、合同法等,对部分信用行为的债权保护提供了保证,但还不能涵盖全部信用行为,对债务人履行义务的约束不完善且不具有强制性。四是,我国尚未建立与发达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作为信用体系基础的信用记录、征信组织和监督制度。根据信用记录,可以评判企业和个人守信偿债的能力。我国对企业信用及经营者经营行为的记录和监督分散在工商、税务、银行等不同部门中,尚未形成体系,既难以形成完整的信用记录,也无法进行有

效监督。而对个人经济行为的记录和监督,目前尚为空白,这不仅影响了个人消费信用的发展,同时也无法提供企业和社会评价个人承担社会经济责任能力的依据。五是,缺乏信用激励和惩罚制度。在企业融资、市场准入或退出等制度安排中,我国还没有形成对诚实守信企业和个人给予必要的鼓励、对不守信的企业和个人给予严厉惩罚的规则。

第三,社会存在较为浓重的急功近利、短视行为。我国当前之所以出现普遍的诚信危机,是因为许多博弈是一次性的而非无限次重复博弈。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使人们感到“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因而短期行为严重;大多数私人办厂缺乏资本和技术,只得“因陋就简”,本身就只想“捞一把是一把”,根本不打算无限次重复博弈;人口众多且专业技能水平都不高,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在某一岗位或某个创业空间长期呆下去的希望十分渺茫,使人不得不只顾眼前而不顾长远;大多数人没有信仰或发生信仰危机,缺乏维系诚信的自我约束机制,等等。很显然,这些引发急功近利、短期行为的因素不消除,我们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普遍的社会失信现状的。

第四,信息严重不对称。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充足的信息。社会诚信实质上是一个信息问题,它存在于一切交换行为之中。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和细化,信息不对称已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而信息不对称又会导致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一般来说,单靠个人努力以弥补不对称的信息,由于交易费用巨大而不可能。另一方面,信息又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和资产,信息不对称使得人们极有可能利用信息缺失甚至制造虚假信息来进行欺诈牟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主要通过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易来进行,信息主要是在各个交易主体之间横向传递。目前,市场上的信息量空前增大,但由于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尚未形成一整套有效的机制来保证信息的公正、公开和有效传递。这就使得市场经济主体之间所了解的信息不对称,从而给失信和欺诈提供了可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各种计划的控制之下进行

的,资源的配置也是根据计划指标的安排来垂直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传递和处理是垂直进行的,根本就不需要信用关系来调节人们之间的经济行为,交易意义上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缺失。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主要通过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来进行,信息主要是在各个交易主体之间横向传递。同时市场上的信息量空前增大,且瞬息万变。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尚未形成一套有效的机制来保证信息的公正、公开和有效传递。这就使得市场交易主体之间,例如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所了解的信息不对称,这就给失信和欺诈提供了可能。

第五,政府行为不甚规范。一是,政府对市场的超经济干预。由于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企关系交织在一起,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新型政企关系尚未完全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还是依靠计划手段干预经济。此种超市场的干预极易造成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最终导致市场诚信的缺失。二是,国有企业的特权性以及寻求政府的保护。由于政企关系的错综复杂,国有企业可以较为便利地从国有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如若还不了还可以把债转股,效益不好的国企可以通过包装到股市中融资,对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地方政府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处境下,不实行依法破产,而是更多地考虑稳定因素,对企业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种特权性诱发了企业的诚信缺失。三是,乱摊派加重了经济主体负担。目前,经济主体的负担较为严重,除了应缴纳的税赋外,相关部门的摊派费用确实令经济主体感到头痛,经济主体按照正常的生产经营就很难再获得一定的利润。因此各种失信的手段充斥于经济主体的生产经营之中。四是,政策的多变性也易引起诚信的缺失。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摆脱不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对市场活动干预过多。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土政策”经常是朝令夕改,缺乏透明度,使得市场经济主体无所适从。第五,地方保护主义。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地方保护的需要,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市场行为,公开维护本地企业的失信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助长了企业的失信。政策的多变加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其实质是地方行政机关对

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的片面强调与保护,而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近年来地方保护主义日趋严重,地方政府充当保护伞,往往与制假贩假、地区封锁等密切相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息,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或局部利益的考虑,公开或私下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纵容企业逃废债,甚至有组织地推动企业实施违法违规破产逃废债。

第六,社会诚信的法律约束薄弱,法制不健全。舆论监督不力等因素,又使得失信者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或即使受到惩罚,失信者因此而付出的成本远远小于其因失信而得到的收益。这种失信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性就使得失信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法律是社会信誉与公平的一道防线,其目的是让守信者因守信而获得回报,让失信者因失信而受到惩罚。而我国当前诚信缺失现象严重的一个根本原因则是法律的约束力不够。一是,尚未建立与诚信管理直接相关的法律,针对诚信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在立法方面,我国只是在已颁布的《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了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刑法》中也有对诈骗等犯罪行为处以刑罚的规定,但缺少与诚信制度直接相关的立法,

现行的这些法规仅对部分诚信行为的债权提供保证,不能涵盖全部诚信行为。二是,对失信行为的惩罚不严,守信收益不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失信行为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缺少有效的惩罚机制,有的国有企业欠银行贷款不还,银行没办法处罚,有的不了了之,造成失信者有利可图,即失信成本低。相反,由于社会尚缺乏相应的风险评级机制,诚信好的企业与诚信差的企业无法区分,诚信的企业和个人甚至被视为“傻子”,诚信者的诚信成本反而加大,这就助长了失信者的气焰。三是,法律的执行不力。我国的司法机关是检察院和法院,分别担负审判监督、控诉和审判司法职权,是担负着社会秩序最后防线的职权机关,但是近年来司法公信力处于下降趋势,普遍出现的法院裁判“执行难”,以及大量存在违背法律程序的现象,如审判严重超期久拖不决等现象,人为地抬高诉讼成本,严重削弱了司法权威。一些基层法院受当地企业和政府的影响,在司法过程中有意偏袒本地企业,审判的公正性受到了质疑,法律的正义性受到了歪曲,成为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诚信缺失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只有找准了原因,才能对症下药进行有效的“医治”。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3]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责任编辑 许婉璞]

## An in-depth analysis of deficiency of credibility

JING Feng, LI Wen-sheng

(Department of Cultural Teaching, the Party School, CPC of Hebei Province,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China)

**Abstract:** The deficiency of credibility results from several aspects: a. social history and traditions; b. individualistic ideology and leadership immorality; c. premature market economy; d. social system or mechanism of credibility. The paper furthers the analysis of each of the causes, and concludes that it is not enough to rely upon only individualist conscience to enhance the social credibility.

**Key words:** credibility; deficiency; cause